

霍松林

文化人影记丛书

霍松林

霍松林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霍松林/霍松林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7
(文化人影记丛书)
ISBN 7-5434-4173-X

I. 霍... II. 霍... III. 霍松林-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9212 号

文化人影记丛书

霍松林

霍松林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4.625 印张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ISBN 7-5434-4173-X/K·166

序 言

从呱呱堕地到现在，已经送走了七十八个春秋，垂垂老矣。这期间，我个人的“业绩”不过是读书、教书兼写书，平凡得很。然而世界风云千变万化，极不平凡，中华民族反专制、反侵略、反饥饿、反愚昧、反落后的艰苦奋斗极不平凡，所经历的曲折动乱、暴风骤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更不平凡。在极不平凡的大环境里，本来很平凡的读书、教书、写书生涯，也就变得并不那么平凡了。因此，自从“传记热”兴起以来，就不断有朋友劝我写自传。我本来是民间歇后语所嘲笑的这么一种人：“蚂蚁掉进磨眼里——有千条路想走！”一听人劝，就跃跃欲试；可是老挤不出时间。更何况，即使写出来，谁给我出版！自己掏腰包吗？我又不是“屁股一扭挣大钱”的歌星。

没有想到，天上忽然掉下个大馅饼；而且，不左不右，

恰好掉进我嘴里。两个月前的一个月明之夜，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张子康先生拿着《图书出版合同》光临寒舍，说他们为了从更宽广的角度展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风貌，决定出一套《文化人影记丛书》，特来向我约稿。我当然喜出望外，立即签了合同。在高效率完成岗位工作的同时加班加点，双休日不休息，夜间少睡觉，不到五十天，就编写出一本《影记》。

我原来构想的自传，不仅要写出我的家学渊源、人生经历、治学道路、教学心得、创作甘苦、心路历程等等，还企图通过这一切折射出近百年来的时代面貌、社会沧桑和民族文化的嬗变。与这种构想相比，这本《影记》当然太简略了。然而原来构想的自传只是文字性的东西，这本影记里却有五十多张照片，直观性很强。同时，有了这本《影记》，以后如果真有时间写自传，也就容易得多。

河北教育出版社不惜巨资，编印这部《影记》丛书，是对社会做出的极大贡献，谨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有幸被列为传主之一，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一九九九年八月写于陕西师大文研所

缅怀童年

一九二一年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我出生于甘肃天水琥珀乡霍家川村。童年时代，老式的私塾已经没有了，村子里有一所初级小学，从校外经过，“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的朗读声便向耳畔扑来。父亲中秀才后曾在陇南书院读书，受过著名学者任士言山长的器重和教诲，懂得治学门径。他认为童年记忆力最强，应该读一些必读书，为将来治学做人打好基础，便用传统办法教我读书、写字；农忙时，就带我下地，学会了各种农活。直到十二岁，才送我到离家十五里以外的新阳学校受新式教育。这期间，我反复背诵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西铭》、《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书，阅读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小说及医学经典著作《伤寒论》。入小学便上四年级，由不懂到懂，各门课都成绩优异，通过全县会考，以第一名毕业，考入离家八十多里的省立天水中学。

上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的第一次作文题是《给抗日将士的慰问信》，我首先交卷，老师看完后即送《陇南日报》发表。那时的天水抗日救亡的气氛很浓烈，我正是十五六岁的青年，热血沸腾，在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的同时，还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发表于大后方的有关报刊。为此，一九九五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把我列入“抗战老作家”名单，颁赠了《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红铜质纪念牌。几年前，我把几首诗词寄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副主编杨金亭先生回信说：“得大作，喜出望外。拜读再三，我为《诗刊》有机会刊发真正诗人的旧体新诗而感到庆幸。我喜欢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表现了并且无愧于抗战时代的诗史性篇章，至今读来，仍令人振奋。”

父母兄嫂都辛勤劳动而让我在“凉房底下读书享福”，我经常感到愧疚，



初中留影(看样子,这该是上高中时的照片,其实不然,它是从初中毕业前夕与同学们的合影中剪下来翻拍放大的)

所以寒暑假回家,仍然下地务农。这不仅养成了手脑并用的习惯,而且深知稼穡之艰难,关心农业收成,关心闾阎疾苦。当时有一首《苦旱》诗:

吃饭穿衣总靠天,天公亦自擅威权。

火云六月无甘雨,枯叶纷纷落旱田。

诗前小序云:“吾乡渭河流过,原可引水灌田,奈无有力者倡之,受制于天,良可慨也。”久旱落雨,便万分高兴。《夏日喜雨》云:

陇山重叠大麦黄,收谷争如布谷忙。

万户欢腾一夜雨,叱牛牵马趁朝阳。

我还喜欢在院子周围种树、栽花、移竹,美化环境。《移竹》诗云:

曾无千章万章松，摩空擎日判鸿濛。
安得千竿万竿竹，拂云浮天接地轴。
我家门迎渭川开，畴昔千亩安在哉？
化龙之笋没榛莽，栖凤之条埋苍苔。
那有劲干射豺狼，更无长枝扫旗枪。
愁雾漫漫塞四极，碧血浩浩染八荒。
我今移得两瘦根，霜枝欹斜护儿孙。
星寒月苦凄迷夜，为报平安到柴门。

这首诗，通过写移竹展现了抗战期间的时代氛围。著名美学家吴调公教授在其《才胆识力，大气包举——读霍松林教授〈唐音阁吟稿〉》一文中说：“抗战次年，匝地兵戈，惨淡龙蛇，他移竹子于渭川老家门口。为此，他想起了‘竹报平安’的佳话，更难得的是想到了‘碧血浩浩染八荒’中的炎黄子孙的命运，从而拓展了‘霜枝欹斜护儿孙’的一种热切而淳朴的祝愿……这确然是骨肉苍生之思，但从见微知著说来，这种艺术浮想的飞翔和灵感的萌发不能不说是才华的熠熠光彩。”

当时我家自食其力，杂粮为主，饭能吃饱，但没有钱。我从小学到初中，是自己从家里背木柴米面自己做饭吃的。衣服，则是母亲用自家生产的棉花纺线织布，用自家门前的槐树花蕾炒焦煮水，染成草绿色，自己按当时学生制服的款式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看着这张照片，不禁思念抚养我、教育我、为供给我读完初中而付出无限汗水和心血的父母亲，默诵古人的两句话：“欲报之恩，昊天罔极。”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永别慈颜已经四十多年了！

佛殿书声

天水中学(简称“天中”)是当时陇南十四县惟一有高中部的省立学校,校址是有悠久历史的陇南书院,图书、设备、师资都不错,很难考,而我以初中三年成绩突出免试直升高中,这是令人羡慕的。可是刚开学便与训导员争吵,被告到校长那里。校长考虑到我是出了名的“好学生”,希望我去检讨,同学们也劝我去检讨。由于那位训导员多次“训”我“读书太杂”、“思想不纯”,我很反感,因而不愿检讨,并且扬言:“天中在地球上,地球不在天中内,天中开除我,我便到更好的学校去!”校长直等到下午快放学的时候,不得已才贴出了“侮慢师长,不堪造就。开除学籍,以儆效尤”的布告。谁知事与愿违,以后不断有人“效尤”,接连有好几位公认的好学生被开除,弄得天中名誉扫地。

我不敢回家,由几位老师资助,坐汽车到兰州考学。而兰州的高中已开学五周,不再招生。我想投笔从戎,却未能如愿,在一所免费的职业学校学了两月,因病回到老家。

抗战开始,大批教师、学生流亡西北,当时的教育部便在水玉泉观办起国立第五中学。本来专收沦陷区学生,由于办学数年,受到地方各界的大力支持,所以这时要招一个春季始业班,给天水百分之三名额。我赶去投考,名登金榜。这真是因祸得福!第一,国立五中的高中老师,多半是大学讲师,甚至教授,另一些则是刚从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毕业的新秀;第二,学生享受公费待遇,吃饭不交钱,每年发一套制服;第三,管理宽松,学术思想活跃,便于发挥个人特长。我在这里学习三年,真是如鱼得水。

五中从高二开始,分文组、理组,我分在文组。国、英、数等主课,文理组合上,所不同的只是文组多学一门国学概论。这门课由薄坚石先生讲授,以他编著的《国学概论》为主要教材,人手一册。薄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

学的前身东南大学，是吴梅、黄侃诸大师的高足，后来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通过他的讲授，我对国学有了较系统的知识。另一位国文老师陈前三先生学问渊博，讲课生动。我在薄、陈两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博览文、史、哲著作，开始写学术论文。有一篇论《周易》的文言文深受他们赞赏。

文组同学，不少人搞文艺创作。例如五十年代中期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牛汉，就是和我同在五中学习的史成汉，当时用“谷风”笔名发表长诗和诗剧，已经是著名诗人。我在五中除了写传统诗词，还写新诗和散文，并为《陇南日报》主编文艺副刊《风铎》。

我当时把主要精力用于文、史、哲和英语学习，但数、理、化等课由于



高中留影(这是我在天水玉泉观国立五中上学期间的照片,大约摄于一九四四年高中毕业之时)

教师精通专业并擅长教学艺术，使我能够在课堂上消化讲授内容，用力省而收效大，从而在全省高中毕业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中稳操胜券。

玉泉观在天水城北，依天靖山修建。攀曲径入山门，过通仙桥，历三十五台阶至人间天上坊，达玉泉阁，抵三清殿。而北斗台、玉泉亭、地母宫、八角亭、草堂院、神仙洞、碑亭等棋布星罗，掩映于苍松翠柏之间，与辐射建筑群关帝庙、药王洞、向家庵等联为一体，蔚为壮观，为国立五中提供了足够的教室、办公室、图书室和学生宿舍。我和好友许强华住在雕梁画栋的无量殿，窗外古柏参天，廊下丁香扑鼻。夜读稍倦，出殿步月，俯瞰秦城，万家灯火俱在眼底，顿觉心旷神怡，诗意盎然。

在抗战八年中，国立五中为祖国培养了数千人才。如今，当年师长多已作古，少年同学也均两鬓飞霜，然而玉泉观的山色庙影和老师、同学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伴随晨钟暮鼓的琅琅书声和昂扬奋进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时时萦绕耳际。

国立五中已成历史名词，知道的人不多了。然而看着这张已经发黄的照片，却更使我怀念在那里度过的峥嵘岁月。数年前，书画家董晴野君假玉泉观创办天水诗书画院，聘我为名誉院长，我在贺诗中抒发了对玉泉观的深情怀念和良好祝愿：

玉泉观上多情月，照我弦歌岁几周！
犹忆松窗温旧梦，忽闻柏院起新楼。
文风大振诗书画，教泽宏施亚美欧。
便拟还乡挥健笔，光辉历史写秦州。

柏溪留影

我于一九四四年冬季毕业于国立五中，寒假后在天水玉泉小学教书，积攒路费，一九四五年七月赴兰州参加高考。当时大后方共有重庆、兰州等几个考区，全国各高校在每一考区分别招生，各校各自命题、阅卷。因此，一个考生可以报考好几个学校。我只报考中央大学中文系和政治大学法政系。为了省钱，未等发榜，考完便回家。到了八月下旬，先后收到在兰州等待看榜的好几位同学好友的信，恭贺我“在全国高考中名列第一”。一看他们寄来的报纸，原来各高校兰州考区的录取名单，中央大学排在最前，中央大学的录取名单，中文系排在最前，中文系录取的新生，我“名列第一”。考政治大学，我也榜上有名。父亲坚持儒家传统，希望我“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我遵从他老人家的意愿，报考了将来可以进入仕途的法政系；但自知不是做官的料，而一贯想搞文学，既然同时考入中文系，当然决意去上中央大学。

从天水乘汽车经双石铺、留坝、褒城、广元、剑门到重庆，走了十多天。当时的汽车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旅途虽很艰辛，而见闻却异常丰富，所以写了一篇包含十来个小标题的《自兰州到重庆》，在中大的一个校报《政潮》上发表，可惜这张报纸没有保存下来。

中大校本部在沙坪坝，我在那里经过口试、体检等办完了入学手续，然后带着行李，从磁器口坐船上溯嘉陵江三四十里，上岸爬山，好容易才到达柏溪。各系一年级学生，都是在柏溪上课的。

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一时举国欢腾，物价暴跌。父亲为我上大学卖掉四亩地，得钱不多，而汽车票价未减，所以到了沙坪坝，已经身无分文。好在毕业于国立高中的学生继续享受公费待遇，吃饭不发愁。上了四年大学，未向家中要一分钱，三年级以后，还给父母寄钱聊表孝心。

柏溪分校修建在地势很高的山窝里。低平处有一道清澈的溪水流过，四座用竹竿稻草搭建的大宿舍，就靠近溪边，洗脸洗脚很方便。宿舍里用三张架子床(上下层各睡一人)围成一个方格，一格接一格，一眼望不到头，中间只留了三条小通道。没有桌椅，每人发一块拴有绳子的木板，将绳子套在脖子上，怀抱木板，在上面绘图、演算、写作，或坐在床上，或坐在山巅水涯的任何地方，都很方便。我刚住进宿舍，感到很新奇，做了一首诗，诗题是《中央大学柏溪宿舍以竹竿稻草为主要建筑材料，共四座，每座容三四百人，其少陵所谓‘广厦’者非欤？戏为一律》。诗云：

突然见此屋，矗立蜀江隈。
烽火燃不到，烟尘锁又开。
宏敞百页户，大庇万国才。
秋雨秋风夜，鼙声起众雷。

出宿舍，走过蜿蜒曲折的小路，爬上几十个台阶，便到了教学区。每天晨起，浓雾弥漫，从宿舍到教室，看不清前面的同学，不小心便会踢上别人



在重庆柏溪上中央大学一年级时的留影
(摄于一九四五年)

的脚后跟。我也做了一首诗：

晨曦失形影，瘴雾掩东西。

吠吠谁家犬，潺潺何处溪。

更无天在上，最怕路临歧。

不识青云客，登阶孰指迷？

中文系一年级的课程有国文、英文、《史记》研究、《尚书》研究、中国通史、哲学概论和体育。入学成绩好的修基本国文、基本英文，成绩差的修补习国文、补习英文。我修基本国文，是朱东润先生讲授的，由杨晦先生讲授的补习国文有时也去旁听。我修的基本英文，由赵瑞蕻先生讲授，有课本，所讲全是文学名著，故称“英文”而不叫“英语”。朱东润先生是分校中文系主任，为我们讲基本国文和《史记》研究两门课程，发作文本时多次表扬我，所以星期日常去请教，关系密切。《尚书》研究由王达津先生讲授，他是年轻讲师，正谈恋爱，我和几位同学喜欢到他宿舍里去吸他的香烟，无话不谈。哲学概论由熊伟先生讲授，主要讲西方哲学。体育课要求极严，学年考试内容是：四个双杠动作，三个垫上动作，八百米长跑，一分钟投篮。考不及格便留级。我是初中篮球校队队员，一分钟投中三十球，其他几项也都达标，受到老师的赞许。

游学金陵

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生于一九四八年春游灵谷寺、谒中山陵，这是部分师生的合影。

中央大学于一九四六年暑假迁回南京四牌楼原址。同学们住进新建的文昌桥宿舍，每室四张架子床，住八人。经过自由组合，我与同班的胡念贻、王叔武、易森荣、颜景常及历史系的丁恩培等同住一室，由于都有较好的文史功底和共同的文艺爱好，所以相处十分融洽，毕业多年，仍书信往来，交情弥深。我与易森荣共据一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一九八七年他专程来访，话旧终宵，我做诗送行：

负笈南雍结好朋，推窗共看蒋山青。

朝吟诗和尖叉韵，夜话床连上下层。

雨后分飞双翮健，劫余重见二毛生。

成行儿女多英俊，莫叹沧桑惜晚晴。

前四句所写的，便是当时的实景真情。可惜胡念贻与丁恩培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从二年级到四年级，学了许多必修课和选修课。胡小石先生讲《楚辞》，汪辟疆先生讲唐宋诗，陈匪石先生讲唐宋词，卢冀野先生讲元曲，吕淑湘先生讲欧洲文艺思潮，伍椒悦先生讲《文心雕龙》，张世禄先生讲文字学和音韵学，朱东润先生讲中国文学史，罗根泽先生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徐澄宇先生讲《庄子》，汪辟疆先生讲目录学和李义山诗，我都认真学习，受益匪浅。

早上高中的时候，父亲就批评我的学习“博而寡要”，要我“由博返约”，在“专”字上下功夫。但学校里开设的课程本来就比较“杂”，我的兴趣又相当广泛，总感到“专”不下去。到了大学后期，感到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基础知识，这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我从幼年起就爱好诗词，又读又作，因而在

大学里跟汪、陈、卢诸名师学诗、词、曲，便用力较多，也受到奖掖和鼓励；与此同时，在听罗根泽、朱东润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多次登门求教，从他们的治学经验中得到启发。这两点，使我在考虑如何“专”下去的问题时起了作用，形成了既搞诗词曲创作，又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和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想法，并且付诸实践。就搞创作说，在《中央日报·泱泱》、《和平日报·今代诗坛》以及《饮河》、《陇铎》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诗词，也有曲，颇引起人们的注意。南京的青溪诗社和白门雅集，都邀我参加；于右任先生主持的“丁亥九日紫金山登高”和“戊子九日小仓山登高”两次盛会，我都应邀参加，结识了冒鹤亭、陈苍虬、陈病树、贾景德、张溥泉、刘成禺、商衍璈、陈颂洛、李拔可等老一辈诗人。在两次盛会参加者中，我大约是最年轻的。

就搞研究说，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同时写札记，写论文。在卢冀野先生主编的《泱泱》上发表的杜甫研究系列论文，已经复印到的有《杜甫在秦州》、《论杜甫的创体诗》、《杜甫诗论》、《杜甫与李白》、《杜甫与郑虔》、《杜甫与严

师生合影（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生于一九四八年春游灵谷寺，谒中山陵时所摄）



武》、《杜甫与苏源明》、《论杜诗的诙诡之趣》等篇。《和平日报》副刊为我开辟了《敏求斋随笔》专栏，先后发表随笔七十多条，都是关于诗歌理论批评的，现在也复印到了。

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三年学习生活，充实而愉快。全系师生每年都组织春游、秋游。南京人讲游览，有“春牛首，秋栖霞”之说，我们就曾春游牛首、秋游栖霞。一九四八年的这次春游，多数师生都参加了，坐的是大敞车，无坐位，车上站满了人，胡小石先生最年长，坐在司机台旁。在这张照片中，前排自右至左第五位女生后面戴眼镜端坐的那位老先生，就是我们的系主任胡小石教授。我站在胡先生后面偏左，即自左至右的第六位，当时春寒料峭，所以穿了一件浅色长棉袍。

每看见这张照片，就怀念母校。熬出漫漫浩劫，我乘赴黄山开会之便路过南京，专程赶到四牌楼，发现原“中央大学”的校牌被“南京工学院”的校牌所取代，校门两旁有人站岗。我给他们看了工作证，然后说：“这里是原来的中央大学，我在这里上过学，几十年没来了，想进去看看。”他们含笑点头，我就进了曾经出入千百次的校门，看了我上过课的教室，看了经常来上阅览室的图书馆，看了僧帽形的曾经多次听名人讲演的大礼堂，抚摩了六朝松的老干，然后出东门在我当年宿舍所在的文昌桥和汪辟疆、胡小石先生当年住宅所在的晒布厂一带徘徊。最后爬上北极阁俯瞰了中央大学遗址的全貌，不禁情动于中，哼了八句诗：

早岁弦歌地，情亲土亦馨。

徘徊晒布厂，眷恋曝书亭。

北极阁仍在，南雍门未扃。

六朝松更茂，新叶又青青。

真的，回到多年思念的母校，一切都那么亲切，连脚下的土也是香的。